

前言 打一场颠覆与反颠覆的攻坚战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明火执仗的对抗相对减少，综合国力竞争在加强。然而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冲突时有发生，霸权主义仍在盛行，某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封锁、控制、演变、制裁等一天也没有停止。中国便是少数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分子的主要颠覆目标。

举世公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力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致以热烈的祝贺。可就有那么几股敌对势力非常害怕中国强大，千方百计要加以遏制，欲置中国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在采取了一系列所谓“西化”、“分化”手段之后，又散布什么“中国威胁论”，找出种种借口对中国加以制裁。真是各种颠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派潜特务搜集情报、窃取我机密便是伎俩之一。本书披露的近 30 宗触目惊心的窃密大案足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国门打开势所必然，走出去与引进来也在规则之中。但切不可来者不拒，尤其是对于超乎寻常热情的外来者，要思虑是否包藏祸心。诱惑是难以抵挡的，但头脑里要时刻高悬国格、人格两面大旗。要记住：嗟来之食不是那么好吃的，侥幸不得，一时冲动会招致终生遗憾。多次血的教训都证明了：“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众目睽睽难逃脱。”

中国要发展，世界要进步，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但

发展与斗争是相伴随的。这种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长期存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一定要睁大警惕的眼睛，分清真金与硫化铜，切不可麻痹大意，尤其要善于识别披着人皮的狼。

上 篇

出卖重要

经济情报的饕餮

公安部发出的通缉令

两个锋头正健的人物，同在国家重要机关，同握重要大权，在不同的场所干着同样出卖国家重要秘密、机密、绝密文件的勾当，且执迷不悟，直到走进铁窗……

引 子

1 984年11月28日，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悄悄地驶进位于北京西城的南沙沟国务院机关宿舍，在标明××号楼的拐角处，熄灭了发动机，停了下来。车窗玻璃拉开一条缝，深棕色的窗帘半掩着。没有人下车，只有窗缝里不时闪过犀利的目光，紧紧盯住楼前的单元门……

天色渐晚，隔着两行已经落光树叶的钻天杨，从玉渊潭湖面上吹来一阵阵带着寒意的朔风，扑进车厢。但车里的人们似乎一点没有察觉，他们像是一尊尊塑像铸在车上，但又比塑像多了警觉的神经。

他们手上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大印的通缉令中写着：

各省、市、自治区、民航、铁路、交通、公安局：

××部外资局副局长何山源，因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等问题，在审查期间，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畏罪潜逃。

何犯身高 1.79 米，方圆脸，面色较黑红，体态较胖，说话较快，操一口河南口音。

请各地区立即部署查缉工作，发现何犯即予拘留，并速告我部。

天南地北，法网恢恢。几天后，何山源便被抓获了。立下此功的，正是那辆面包车上的人们。

也就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就在审讯何山源的预审室对面的另一间屋子里，一份新卷宗摆在了预审员面前。北京机场海关查获，R 国某商社常驻中国商贸代表大田先生，在回国时，公文箱中装有大量我党和国家经济绝密、机密，秘密级文件资料。经审讯获知，这是 ×× 部技术进出口局干部袁立新提供的。

两名案犯竟同在一个机关，虽素不相识，但都被公安机关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进行审查，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同一条筒道之中。

不仅是办案人员们在痛心地思索、叹息和摇头……

一份关于两起案件，两名罪犯主要罪行以及可能给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带来重大损失的初步估价的报告，也送到了国务院一位负责同志的写字台上。据说，这位负责同志把报告详尽、认真地看过了，但是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批示，是被一种沉重心情压倒了他的通常思维，还是在想一些更深远的事情？

时隔不久，在进入 1985 年 11 月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发表重要讲话，接着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八千人大会，一致强调：在开放、搞活方兴之机，在老问题不断解决的同时，面对新形势

新情况下的新的不正之风，必须予以解决。要建设精神文明、清除腐败现象，整顿中央机关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因为它关系着我们的党、我们改革的生死存亡……

我们在想 也许 这两个案件 也是形成这场有声势的活动的一个小小的引子。

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全面改革 实行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必须排除来自各方面，各种形式的干扰，荡涤那些随着大江洪流冲泄而下的污泥沉渣。从某种意义上讲，何山源、袁立新也给我们上了一课，添了一剂冷静的思考。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把这两起案件披露于世。



有人说 人生像一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 像一匹用理性和下意识的丝线织成的锦缎 经纬难分 瞬息有变。

1983年5月25日 江苏省苏州市外经委的两名同志 来京汇报苏州市利用外资方面的工作情况。

横向按块块分，这个地区的利用外资工作正好归属何山源负责 如果按纵向条条划分 他的主管项目有机械、交通、冶金等等。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何山源就是权力的化身。

苏州的同志很恭敬地向何山源汇报了工作。谈话中，他们以试探的口吻问何处长：最近，香港某公司总裁杨小姐，正在和苏州谈判有关进口扳手原料在苏州加工事项。她看了苏州工厂，以为从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素质，到厂方的管理以及设备情况，都可以完成这种简称“来料加工”的任务。这样做双方都可以赢利。目前，杨小姐正在北京 何处长是否能出面会见一下，

哪怕仅在客观上介绍一下我们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也可以。

苏州同志的本意是 如果何处长亲自出面了 似乎就是一种姿态，等于向港商杨小姐表明，苏州方面对合作项目是重视和有诚意的。

到现在为止，也不能说苏州同志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他们的心愿是善良美好的，如果合作项目顺利谈成，也会给苏州经济发展带来益处。

但是 他们却没有想到 何山源‘假道灭虢’了。

当时，何山源客套了几句工作太忙，要办的事太多之类的话，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1983 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速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年头，时代的浪潮给社会和人民以巨大的冲击。这里有一个十分活跃的酵素，就是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由此还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反思，传统思维形式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甚至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连北京最普通市民见面的话题也是 深圳、合资企业、外汇、引进……

作为党和国家对外开放工作的具体参谋、办事机关，××部此刻的重大责任也就不言而喻。这个部是在开放搞活中，由国务院原属的三个单位组建的。这种大规模的合作意义十分明了 形势要求 必须有一个减少层次、理顺关系、思路清楚、开拓能力强的办事机构。领导上对干部也有要求：竞争力强、水平高，尽可能避免消极因素，坚定不移地把党对外开放的方针贯彻好。

何山源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 ××部外资局的 同时被任命为副处长。

用求实的态度回过头来看，当时这个任命没有什么错误。

案件发生后，办案人员曾沿溯何山源走过的道路，做过一番认真的调查。几乎每到一处，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何山源在这里时，发现过他有什么问题吗？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这种思维形式也许不太正常 对一个侦查办案人员来讲，依照这样清楚准确的概念来开展工作，却是十分必要的。他们的职责就是：再发现蛛丝马迹，扩大线索，不留后患。

他们得到的答复几乎是一致的，就是无可指责。

何山源从家庭中得到的，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后代的严格要求。他的父亲是我党一位很有功绩的老同志，1973年在“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下含冤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 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何山源本人在中学加入共青团，以后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先后在国家的几个主要部门工作并入了党。

调查记录上 几乎都是这样写道 此人是革命后代 对党有感情，也做了不少工作。对完成本职工作有能力和热情，团结群众也不错 人缘很好。

在正襟危坐的公安人员面前如此出证，其真实性应该说是可信的。

生活的确是复杂的。

唯一提到的何山源的缺点，就是有关部门一位领导同志说：“这个人 组织纪律性差了一点。”

似乎是个问题。可是按照“金无赤足 人无完人”的观点来说 似乎又不是。

还是让我们把镜头拉回 1983 年 5 月 26 日吧。何山源在两位苏州同志的邀请下，来到了北京饭店新楼。

就像工人熟悉自己的车床 会计熟悉算盘 老师面对教课的

黑板，何山源出入宾馆饭店，也是家常便饭。他是从紧张的、繁杂的工作中脱身出来的。他在心里只把这次会见当作一次普通的工作。他没有特意选一件质地较好的衣服换上，头发也未经过梳理。他就那么随随便便的，手里还掐着一支吸了半截的香烟，从××部大楼走出来，沿着长安街上的斑马线，走进了北京饭店的自动门。

尽管如此，和街上的行人相比，何山源还是颇有一种潇洒风度的。这种风度不是精心修饰所能得到的，它来源于长期高雅、有修养的家教，来源于本人高层次的智能结构，也得益于这几年来，国际航班上的飞来飞去，外交场合的进进出出……

何山源还清楚地记得是 6009 房间。这四个阿拉伯数码在他的一生中太重要了。

他和苏州同志走进房间时，香港某公司总裁杨小姐正在接待客人。她裹着一股香气迎上前来，热情地把他们迎到沙发上坐下，然后用略带广东音的普通话向他们道歉：

“对不起，请稍坐，我这边马上就要结束的……”

何山源欠欠身，表示不客气，然后悄悄地打量起这位颇有名声的女人来。苏州同志曾向他介绍，杨小姐芳龄 38 岁，过去曾是很走红的影视艺员，息影后嫁给了一个商人，不幸丈夫去世，她便接过丈夫的遗产，从事经济贸易。在何山源眼里，杨小姐似乎比介绍的年龄要大一些，但她确实漂亮，顾盼之中有一种媚态，撩动了何山源的心弦。他半仰在沙发上，目光移过豪华的室内布置，那种温柔典雅的浅色调，再加上耳畔杨小姐那银铃般的笑声，竟使他如梦如痴了……

客人走后，杨小姐旋风般地飘过来，拉住何山源的手，热情地摇动。她的名片也带着一股馨香，很雅致。他们面对面坐下，毫无拘束之感。杨小姐似乎有一种魔力，把这种场合惯有的客

气、分寸、冷场……统统吹而散，这给何山源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这次谈话的内容，没有离开苏州引进项目的话题，至多作为题外花絮，表现双方都具有的广博知识，引到了诸如“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之类的诗词。

会谈时间不长，两天后，苏州同志打电话找到何山源，通知他：杨小姐要请客，希望何处长到场。何山源没有推辞。那天，宴会厅那金光灿灿的吊灯和高脚杯中的葡萄酒交相辉映，把赴宴的人们都映照得神采奕奕。席间，杨小姐不断地殷勤询问何处长喜欢什么菜、什么酒，并亲自执羹为何山源布菜。何山源彬彬有礼，却终不免喝得面红耳热。

后来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预审室里他说：“这次请客吃饭，我们便更熟悉了。”

时间推移，转眼到了6月份。一天，何山源正在办公室和几个同志研究工作。此时的何山源对本职工作还是尽职尽责的，也是相当紧张忙碌的。因此，当电话铃响的时候，他很不耐烦地接过来，问道：

“是谁什么事？”

电话里传来的是杨小姐的笑声。

他皱了一下眉，但很快又舒展了。他想起，电话号码是自己在宴席上留在杨小姐名片上面的。

“请你明天早晨到北京饭店和我一起吃早餐，好吗？”

“对不起，明天早晨我还有会要参加。”

杨小姐停了片刻，又说：“那么，明天中午我请您到建国饭店吃中餐，你散会后到北京饭店，咱们一起去。”

何山源觉得盛情难却，便答应了。

第二天中午，何山源等会议一结束，便匆匆来到北京饭店直

奔杨小姐的房间。一回生，二回熟，这次他只是在门上轻叩了两下便推门进去了。杨小姐正坐在梳妆台前做出门的准备，唇膏、眉笔、香水……推开一片，见何山源进门，她在镜子里向他嫣然一笑……

“哦，你在化妆……”不知为什么，何山源有几分慌乱。

“就好了……”杨小姐回过头来，一边在手腕上搭一块坤式小表，一边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何山源，那目光分明暗示着什么……

在预审室里，何山源低着头，做了如下的陈述：

我以为杨小姐是让我帮她扣表带，我犹豫了一下便上前去了，用两只手在杨小姐腕上的表带上扣着。当时太紧张了，摆弄了半天也没扣上，我记得我额头都渗出了汗珠，脸上也憋得火辣辣的……

杨小姐这才嗤的一声笑起来，自己把表带扣上了。

我们俩一起往房间外走时，她在前，我随后，走到房间门前，杨小姐突然回身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欠起脚，把整个贴在我身上，扬起脸要在我脸上亲吻。我当时太紧张，自己躲开了……

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守则规定，在和外商、港商进行谈判交易的工作中，事先必须请示，工作中要有两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何山源这次赴会，事先未请示，也没有两人同行。

也许这就是他“组织纪律性差一点”的表现。

中国有句老话：蝼蚁之穴，足以溃堤于千里。



无论在经历、学识、级别、贡献上，袁立新与何山源都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之间，从各方面看都有很大差距。

在外商眼里也是这样。如果何山源是一潭清水中能掀起点浪花的大鱼，那袁立新不过是潜栖在岸边的小虾。

因此，袁立新的落水也没有何山源这样富于戏剧性的浪漫色彩。在内容上，倒是八仙过海，各有“神通”之处。

1984 年临近年夜的一天，北京机场已经披红挂彩，准备迎接节日了。候机大厅内外，人流熙攘，十分热闹，连机场工作人员的动作节奏也似乎加快了。

R 国某商社常驻中国代表大田先生，这时在大厅那自动开启的大门旁，跳下了一辆豪华型皇冠轿车。他手里提着一只带密码锁的公文箱，神态自若地向海关检查站出入口走去。他要回国休假。

护照检查完毕，一个身穿黑色海关制服的工作人员跳下工作台，有礼貌地拦住去路。

“您是大田先生，请到我们办公室去一下。”

他面带愠色地来到海关办公室，他的公文箱被打开了。不用翻拣，几份复印材料显眼地摆在箱内，黑体的字迹突入人们眼帘：

《××委××××年引进技术设备计划》、中国××总公司 1985 年至 1990 年引进项目表》；《××市××××年技术引进改造项目表》；《××部 1995 年进口计划项目表》

秘密、机密、绝密…… 标得清清楚楚！

海关工作人员震惊了。一位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志从公文箱里拣出这些复印材料时，手在微微颤抖。几张薄纸，重有千斤！

“这是怎么回事？”人们的脸色严峻起来，“你能解释吗？”

大田先生的脸变得苍白了。他被告之，在事情弄清楚之前，他不得离开中国。回家团聚的愿望暂时破灭了，他沮丧地回到友谊宾馆驻地，用很熟练的中文向有关部门写出了说明材料：

我们商人很希望预先掌握些中国方面引进技术设备的情况，以便把事情办得好些……

我认识了 ×× 进出口局的袁立新，他所分工的工作范围和我管的差不多。这些情况都是他向我提供的。

略微了解一点国际企业界情况的人都知道，80 年代是企业经营环境变化异常激烈残酷的年代，因此也是情报化的年代。“商战”的明争暗斗，有时比一场明火执仗的流血战争还要不惜工本，不择手段。

可惜，我们许多同志似乎还认识不到这一点。

据一份内部资料记载：60 年代，考虑到当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著名的大庆油田作为我国的战略工业建设项目，从规模、技术、范围、产量……甚至到地名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是当 1966 年的动乱开始之际，某画报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刊登了一组大庆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铁人王进喜站在一段铁栏杆旁边。某国情报人员根据铁人的服装，立即推断出大庆是在我国冬季气温在 -35℃ 的东北地区，大致在哈尔滨附近；又根据那段铁栏杆，推测出这是反应塔的扶栏，其炼油能力为年产 360 万吨。

左右。因此，该国立即着手准备和我国进行出卖石油设备的谈判，掌握了主动……

又据一份通报介绍：1982年，我国某部一位领导无意中向外透露了我国一项重要物资的缺供情况，使外国人连呼“好消息”。随之，该国几家报纸放风说中国将大量购买这种物资，制造涨价气氛。由于当时此种物资的国际价格正在下降，他们还派人到几个生产国游说，结果使价格一下子提高了十五到二十

在和外国人打交道中，我们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我们的学费交得未免太多了！为了坚持开放、搞活政策的顺利施行，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学得聪明一些吗？

还有更应引起警惕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何山源、袁立新这样的丧失尊严和人格的民族败类。

大田先生的说明材料给了办案人员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袁立新这个名字。不久，经过初步的调查，事情基本搞清，大田先生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国了。在采访中，办案人员告诉我们：大田先生还不是那种专门猎取情况的特务，这一点从他没有丝毫夹带情报的常识就可以看出。

此刻，身为进出口干部的袁立新，正在我国广东、深圳地区陪一个外国经济代表团考察访问。当代表团出境后，他在白云机场准备登机返京时，被广州市公安局的四名民警前后左右围住。为首的民警向他宣布：你已被依法拘留审查。

袁立新拒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他在预审室里大喊大叫，气焰十分嚣张：

“你们懂什么！我国计划项目是可以向外商介绍的，连外长、副外长出国还附带介绍项目呢！”

法庭开庭审讯，他甚至提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根本不懂外贸工作，应该退席。

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中，他写了一份委托书，请预审员转交到单位，上面写道：“我请部里为我找一位对外贸易法方面的律师，为我出庭辩护。”

预审员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慎重、负责的，他们深知，这种案件的审理，敏感地牵连到对外开放后某些在新形势下开展的新工作。处、科领导也反复要求，务求一个“准”字，要经得起时间、历史的考验。

预审人员来到××部机关时，刚刚介绍了一部分情况和袁立新的狡辩，进出口局一位长期从事外贸工作的领导同志，立即对预审人员说：他在唬你们呢！……”

按照形式逻辑，袁立新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在中国古代的三十六计中，这叫作“偷梁换柱”。



在我国内部经济情况是否要向外商保密这个问题上，何山源比袁立新明智。

他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里写下的一份认识材料中，就这样提到：

我们从事外资引进工作，有中外双方参加，保密是双方都要做的。这个问题本应属常识范围内的概念。

要不然，香港某公司总裁杨小姐，何必在他身上下这么大功夫呢？

已经进入 80 年代中期了 如果我们又把“糖衣炮弹”这样的词汇从人们的记忆中拖出来，恐怕很多人在感情上已经难以接受。

可事实却正是这么回事。具体点说 何山源中的是“肉弹”，而袁立新则败在“酒肉兵”下，只不过一切都涂上了一层新的色彩而已。

已经耳热心跳的何山源跟随在杨小姐身后，走出了北京饭店前厅。杨小姐来京后包租的“红旗”牌高级轿车，已在大门前等候着他们。

汽车拐下长安街 正赶上交通管制上的“绿波线”不出几分钟，汽车已经停在建国饭店门前的喷水池前。服务员迎上来，为他们打开了车门。

西餐厅里 杨小姐预定的餐桌已经摆好了精致的餐具 酒杯里插着洁白的餐巾，叠成一朵典雅的马蹄莲。

一切是不是太顺利了？何山源来不及思考。

杨小姐粉面桃花 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席间 她斟酒、挟菜，依然谈吐自如 恰到好处 无可挑剔。

何山源尽管心里打鼓，却也落落大方。

杨小姐提出能否在大陆买一些土特产品 如大蒜、芋头之类出口；何山源尽自己所知，推心置腹地为对方参谋了几个意见。

双方都还保持着公事公办的态度。

何山源已经记不清杨小姐是怎样又把他邀回北京饭店她的房间里去的。

他只记得 杨小姐关上房间门时 特意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正是午休时间，没有人会对此置疑。

何山源坐在沙发上 杨小姐自己进了卫生间。片刻 换了一身质地、做工都很考究的睡衣，飘飘地走了出来，躺到了厚软的